

中国现代史讲义

(上册)

第一编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编写说明

中国现代史讲义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编写说明

《中国现代史讲义》上册，是为教学急需由五个院校合作编写的，供内部历史专业基础课教学试用。

本讲义共分五编，编写的具体分工是：

第一编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吉林大学。

第二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辽宁大学。

第三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河南师范大学。

第四编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大学。

第五编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哈尔滨师范学院。

编写工作从一九七九年二月底开始，到十一月中旬结束，在编写过程中，郑州大学等院校的同志参加了讨论。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编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

(1919年5月——1923年12月)

第一章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1921年6月)

第一节 五四前夜的中国..... 1

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孙中山的护法运动..... 1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 8

三、《新青年》的创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5

第二节 五四爱国运动..... 24

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24

二、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30

三、“六三”工人大罢工和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 38

第三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45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45

二、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大论战..... 49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革命运动的新发展

(1921年7月——1923年12月)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70
一、共产党筹备小组的出现及其活动.....	70
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	76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81
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工农业 发展的迟滞.....	81
二、直系军阀的“武力统一”和各省军阀 的“联省自治”.....	91
三、共产国际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 题的指示.....	99
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02
第三节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农民运动的 兴起.....	108
一、香港海员大罢工，工人运动第一次 高潮.....	108
二、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	116
三、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的开始.....	122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	126
一、孙中山晚年的伟大转变.....	126
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29

三、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的斗争.....	134
第五节 文化思想战线的斗争.....	137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的深入 宣传	137
二、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和反对复古主义的 斗争	139
三、“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143

第一章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1921年6月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的中国

一、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和混乱的政局

1912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皖系、奉系三大势力。直系军阀以曹汝霖、曹錕为代表，皖系以段祺瑞为代表，奉系以张作霖为代表。直系军阀在曹錕死后，由曹汝霖继任，但曹汝霖在政治上并无实权，实际权力掌握在段祺瑞手中。段祺瑞在1916年复辟帝制失败后，虽然名义上退位，但实际上仍然掌握着北洋政府的实权。段祺瑞在政治上采取亲英美政策，排斥日本势力。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和分裂，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提供了社会背景。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经济上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为了维持其统治，大肆搜刮民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同时，北洋军阀还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造成了社会的黑暗和混乱。这种社会背景，使得五四运动具有了深刻的社会基础。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更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第一编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 党的创立时期

(1919.5 — 1923.12)

第一章 五四运动

(1919.5 — 1921.6)

第一节 五四前夜的中国

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孙中山的护法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袁世凯代替清朝皇帝，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最高统治者。日本、美国两个帝国主义，趁英、法、德忙于欧战，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梦想凭借武力独占中国，美国借助雄厚的资本力夺侵略中国的领导权。做为日美侵略政策和矛盾争夺的直接产物，是袁世凯称帝和北洋军阀割据混战的分裂局面。

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是辛亥革命后中外反动派最为关注和重视的实力人物，得到东西方帝国主义的承认和支持。一九一三年，五国（英、法、德、日、俄）银行团同袁世凯签订善后大借款，借款总额为二千五百万英镑，支持他扑灭南方各省的革命武装和讨袁的“二次革命”。袁世凯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就图谋把已经被人民推翻了的封建君

主制重新加在人民头上。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九一四年一月，下令解散国会。五月废止了辛亥革命产生的临时约法。接着，通过新选举法，把为期五年的大总统任期改为十年，并可无限期连任，使自己成为终身的独裁元首。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早为日本政府所识破。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当面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暗示日本将赞同变更国体，助袁称帝。袁世凯急于称帝，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于五月九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英国公使朱尔典也就帝制复辟一事，对袁世凯说：“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许诺，自认外交已经成功，就决心立即废除共和国体，建立袁氏王朝。一九一五年八月上旬，袁世凯的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在袁世凯指使下，杨度、孙毓筠等六人发起筹安会。一些反动官僚和地方军阀，伪造民意，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改行帝制，举行“国体投票”。参议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在假意推让之后，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于十二月十二日，咨复承认帝位。

和袁世凯的愿望相反，历史的潮流是要民主共和，不要帝制。随着袁世凯卖国求荣真相的暴露，全国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帝制的斗争。留日学生得悉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后，立即以留日同学会的名义，向国内发出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李大钊起草），揭穿“二十一条”的黑幕，沉痛地指出亡国危机，号召全国人民，万众一

心，抵抗侵略。城市各阶层人民也沸腾起来，展开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反袁成了不可抗拒的潮流。

梁启超的进步党，曾经支持袁世凯镇压反袁势力，解散国会。由于袁世凯决心称帝时，该党的大部分人受到了冷遇，也由于看出袁氏政权的不稳，为了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首先在云南打出护国讨袁的旗帜，站到反对帝制的方面来。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辛亥革命时云南都督）宣布独立，组成护国军，攻入四川。袁世凯急派周自齐为特使，赴日乞求援助。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见袁世凯的统治地位已经风雨飘摇，他需要寻找新的工具，不仅拒绝接待特使，还联合英、德、俄、意等国，向袁提出缓办帝制的警告。护国军战幕揭开后，黔、桂、川、湘等省纷纷响应，袁世凯无可奈何，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向全国公布取消帝制令，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八十二天的皇帝梦到此结束。六月六日，独夫民贼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北洋系统的军阀分裂成许多派系，势力最大的是皖系和直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继承了北洋主力，窃据北京中央政权。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占据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日本支持皖系，美国支持直系。在各地，东北的张作霖是日本扶植下的工具，在袁世凯阴谋称帝期间，形成了奉系军阀的割据势力。山西的阎锡山原是袁世凯的支持者，袁死后，仍占据山西的地盘，形成晋系军阀。还有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湘系军阀（谭延闿）、粤系军阀（陈炯明）等。

在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的是黎元洪，但实权却掌握

在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段祺瑞手中。一九一七年初，日本唆使段祺瑞参加欧战，以便进一步控制中国。美国先是希望中国参战，共同行动，后发现中国参战有利于日本，又主张中国暂不参战。日美在中国参战问题上的矛盾，直接反映为黎段之间的斗争。一九一七年四月，段祺瑞召集依附于他的“督军团”，向黎元洪施加压力，唆使军警和雇佣流氓，包围国会，殴辱议员，胁迫国会通过参战案。黎元洪以美国为后援，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又通电全国，煽动督军团倒黎。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独立”，奉、鲁、闽、豫、浙、直隶各省军阀相继响应。皖督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进京，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随后演出了一出清帝复辟十三天的丑剧。段祺瑞见倒黎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借助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威，在日本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讨伐张勋。打垮张勋后，段祺瑞重掌政权，迎直系军阀冯国璋（原为副总统）为总统，自为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八月十四日，段政府发布对德宣战令，并趁机扩充了他的“参战军”。

段祺瑞把持的北京政府，继续推行卖国政策。在一九一七年八月至一九一八年九月的一年间，段祺瑞即向日本借款达五亿元。这些借款大部分名为经济借款，实际上用来购买军火和编练“参战军”。借款条件多半以银行、矿山、交通事业作担保，不仅助长了军阀战争，而且使帝国主义更深入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订立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军队大批开入满蒙，控制了东北和蒙古的广大地区。同年九月，段祺瑞政府在《山东问题秘密换文》中，以“欣然同意”字样，承

认了大战期间日本在山东取得的特权。在此期间，段祺瑞还利用卖国借款收买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制造皖系把持的新国会——安福国会。一九一八年冯国璋总统期满下台，安福国会推老官僚徐世昌为总统，供其利用。段祺瑞的亲日卖国外交，在国际上引起英美的嫉视，在国内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消息一传出，留日学生和国内学生就纷纷成立救亡团体，采取行动。各界人士以及西南各省当权人物也都通电查问。全国上下的反段气氛，把本来存在的直皖矛盾，进一步推向尖锐化。冯国璋虽已下台，直系势力仍然存在，曹锟、吴佩孚继冯成为直系领袖。为了缓和直皖矛盾，段祺瑞于一九一八年十月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专任参战督办。但是，他只是退居幕后，实际上仍然操縱着北京政府。

军阀们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的统治，不断地扩大他们的反动军队。一九一四年，全国陆军不过四十五万七千人，到一九一八年就增加到八十五万人。随着军队的不断扩大，军费开支逐年增加。据统计，北京政府的军费开支，实际上占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一九一八年北京政府的军费预算达二亿零三百万元，比辛亥革命前夕一九一〇年增加一倍。为了筹措庞大的军费，军阀们横征暴敛，对人民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为了扩张地盘，满足个人野心，军阀之间进行连年不息的战争。在无休止的战争中，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无穷的损失。

祸国殃民的军阀统治，使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把国家败坏到极点，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和挽救国家的危亡，全国人民不能不起来进行反对封建军阀

的斗争。

一九一四年七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在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决心“再举革命”。中华革命党的总章程规定，党的宗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反袁作为革命的目标。孙中山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希望严密组织纪律，又规定入党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许多革命党人因反对这个规定拒绝加入，党员最多时只有五百来人。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便分派干部到江苏、浙江、广东、山东、陕西等地，组织暴动或暗杀活动。中华革命党在反袁斗争中是比较坚决的力量，但由于它严重地脱离群众，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孙中山例来把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民国”的象征。他认为“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国内纷争，皆由大法不立”，“解决今日时局，恢复国会为惟一之根本”。维护临时约法，一直是孙中山政治斗争的旗帜。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由上海到广州，发动护法运动。随同孙中山南下护法的，有海军第一舰队和一批国会议员。八月，孙中山联合西南宣布“自主”的滇系、桂系军阀，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发表“护法宣言”。九月，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为元帅。在护法号令之下，西南六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宣布以武力对抗北洋军阀政府，开始了“护法之役”，战争的重心在湖南。

护法军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经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首先，西南军阀虽然附合护法，要求恢复旧国会，但他们对于临时约法和国会并无兴趣。桂系首领陆荣廷和北方的

直系军阀素有勾结，和皖系军阀也有密约，他参加护法，不过是保护自己的地盘和北洋军阀讨价还价。滇系唐继尧则是因为他的大云南主义遭受打击，不得不与桂系和孙中山联合，对抗北洋军阀的威胁。至于那些议员们，大多是为北京政府所排斥的官僚政客，他们南下只是为了找寻升官发财的捷径，如果不是遭到段祺瑞的打击排斥，他们断不会投到护法的旗下。所以，军政府一成立，军阀、政客、官僚就在各方面破坏护法运动。孙中山希望借西南军阀的武力来进行护法，只能是与虎谋皮。其次，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没有鲜明的可以动员群众的战斗纲领。临时约法在军阀的任意蹂躏下，几年来已不被人们所重视。所谓国会，已成为政客卖身分赃的活动场所，即使恢复，也不过是军阀们粉饰门面的工具。全国人民所需要的是推翻所有军阀的反动统治，而不是恢复约法和国会，因此，护法起不了动员人民的革命作用。由于有上述的弱点，护法运动就不可能收到什么好结果。

段祺瑞没有把南方的护法政府放在眼里。一九一七年八月初派兵讨伐。十月六日，攻下衡山、宝庆，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平定西南。北京政府的冯国璋惟恐段祺瑞在战争中扩大势力，直系难以与之对抗，授意直系的四个督军（直督曹錕、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联合通电停战，主张与护法军政府议和。

直系主和之议一起，西南的桂系便积极酝酿妥协。为了便于向北方的军阀求和，一九一八年五月他们改组了军政府，废大帅一长制为七总裁合议制。推选唐绍仪、伍廷芳、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林保懌七人为总裁，而以政学系首领岑春煊为主席。护法政府经过这一改组，完全

变成徒具形式的议和组织，孙中山在实际中被排斥了。孙中山愤恨桂系军阀的跋扈，本身又无力反击，被迫向国会非常会议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至此，他所领导的第一期护法运动失败了。经过这一番挫折，孙中山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①孙中山到上海后，回忆护法政府的情形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讎所快，终于辞职以去”。^②这时他一筹莫展，意志消沉，完全陷入苦闷和绝望的困境。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法、俄、德、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一九一三年外国来华船只为二四，四九一，八三八吨，一九一六年减为一八，五八一，三三三吨，一九一八年再减为一四，三五七，六四八吨。各国输华的商品总值：一九一三年为一四，三五七（海关两），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五年间，每年都低于一九一三年，其中一九一五年为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七十九强。又由于帝国主义忙于军火生产，过去依赖帝国主义输入某些工业品的国家，不能再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充分供给，在客观上又给了中国某些轻工业品进入世界市场的可能。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大战期间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① 孙中山：《辞大元帅职通电》，（1916年5月4日）。

② 孙中山：《复港商陈震如函》，（1919年）。

根据一八九五年以来新设厂矿资本额的统计：从一八九五到一九一三的十九年间，全国新设厂矿数共五百八十八个单位，投资总额为一二〇，二九五千元，平均每年设立厂矿三十至三十一一个单位，每年投资额为六，三三一千元。而从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九的六年间，新设厂矿数共三百七十九个单位，投资总额为八五，八〇〇千元，平均每年设立厂矿六十三一个单位，每年投资额为一四，三〇〇千元。除新设厂矿外，一九一四年以后，原有厂矿也积极扩充。如山西、江苏、安徽、河北等地的煤矿，在一九一五年以后，相继增加资本，添设新井，扩大矿区。轻工业的扩充则更为普遍。在纺织、面粉、榨油、制盐以至矿冶工业中，都有大批的手工业工场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化。由于国内市场的扩展，中国民族工业的企业利润有了显著的增加。例如上海申新一厂，一九一五年的实际盈利为两万元，一九一七年就增到四十万元，一九二〇年又增到一百一十万元，五年间增加了五十五倍。工业利润猛增，刺激了国内工商业的投资，资本家把获得的高额利润，迅速转化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华侨商人增加了国内投资的兴趣，一些军阀官僚也以其搜刮所得转入工业生产，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工业资本的力量。当时的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一九一四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为六，二〇〇万元，而一九二〇年则增为一五，五〇〇万元以上，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同时，资本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大企业，一九一四年占工业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四，而一九二〇年增加为百分之十四。

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在轻工业方面，其中以纺织业和面粉业最为突出。民族资本的棉纺织厂，在一九一五年

共有一五家，到一九二二年增至六十四家。纱锭，一九一五年为五四四，〇一〇枚，一九二二年增至一，五九三，〇三四枚。布机，一九一五年为二，二五四架，一九二二年增至九，八一七架。据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间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共有面粉厂一百二十三家，其中主要是民族工业。在一百二十三家中，有一百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建立起来的。一九一四年面粉尚入超，一九一五年就转为出超三八，三二三两，一九一八年出超增至二，〇〇七，三一七两，一九二〇年出超达三，四四九，二五〇两。

重工业方面也有某些发展。一九一三年，民族资本经营的煤产量为六四八六万吨，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五十点七，到一九一九年达一〇一二六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二。铁矿、生铁产量也有所增加。

中国民族工业虽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但是这个发展还是有限的，而且有很大的弱点。

首先，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轻工业上，重工业的增长很微弱。如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民族资本开设的一千零六十一家工厂中，属于轻工业的有六百七十五家，占百分之六十三点六，而属于冶炼工业的仅有四家，占百分之零点三七。重工业的大部分，仍旧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如铁矿生产，一九一三年全国总产量为四五九，七一一吨，一九一九年增为一，三四九，八四六吨，全部为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生铁生产，一九一三年全国总产量为九七，五三一吨，一九一九年增至二七七，〇六三吨，也全部为帝国主义所控制。机械开采的煤矿，一九一三年总产量为七，六七七，五七〇吨，其中为帝国主义控制的占百分之九十三，

一九一九年总产量达一二,八〇四,六三六吨,帝国主义控制的仍占百分之七十五点六。电力,几乎全部操在帝国主义手中。帝国主义雄厚的银行资本,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主要债主,著名的拥有九个纱厂的申新公司和十一个面粉厂的福新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即已开始举借外债。这种情况注定了软弱的中国的民族工业,根本无法摆脱对于帝国主义的依赖,和不能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

其次,中国民族工业不能割断它同封建势力的联系。在资本占有上,资本家和地主常常是“一身二任”。如棉纺织业,在当时创办纱厂的资本家中,有很多就是军阀、官僚、地主,只有少数才是真正由工业资本不断积累起来的。而资本家在获取高额利润后,往往又向农村购买土地,兼有地租剥削。在商品流通、市场限制、税收等方面,封建势力又同民族工业处于尖锐对立之中。以厘卡为例,一九一一年全国设厘卡竟达七百三十五处,这不能不严重地束缚民族工业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美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趁西方各国忙于战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在贸易方面,一九一四年日本输华物资总值为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一七年就增至三一八,三八〇,五三〇元,一九一九年又增至四四七,〇四九,二六七元,五年增加近两倍,跃居外国对华贸易第一位。在投资方面,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一年的七年中,日本在中国开设的规模较大的厂矿就有二百二十二家(不包括在华掠夺的工厂)。帝国主义在华控制的矿冶工业,大部分为其所有。而棉纺织业的扩张最为迅速,一九一三年日本在华纱锭为一一一,九三六枚,一九一九年为